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中日文学经典的 传播与翻译（下）

王晓平 著



中华书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下）

王晓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王晓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101 - 10030 - 3

I . 中… II . 王… III . ①比较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日本
②文学 - 文化交流 - 中国、日本③文学翻译 - 对比研究 - 中国、
日本 IV . ①I206②I313.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4532 号

书 名 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全二册)

著 者 王晓平

丛 书 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 王 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79 1/2 插页 8 字数 10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030 - 3

定 价 234.00 元

第九章

中国史传文学经典的日本传播与研究

中国史传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很早便有了教育制度的保障。在日本律令制的大学寮里设立了专门教授历史的学科——纪传道，而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学习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后来，纪传道与学习汉文学（主要是中国文学）的文章道归并，开始成为教授历史、文学两门学问的学科，而且各自正式名称，学科称为“纪传道”，而博士则各称为“文章博士”，统称“纪传博士”、“文章道”。也有一种说法是在合并当时，还没有使用“纪传道”、“文章道”这样的称谓。在明治以后，也曾经出现过一种误解，说是文章道吸收了纪传道而形成了“文章道”、“文章博士”。按照原本的说法，仍然可以认为，学科称为“纪传道”，博士称为“文章博士”。总之，在律令制的大学寮中，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科，培养了钻研中国以“三史”为主的人才，文章道、纪传道学科合并之后，更密切了文史之间的关系，在平安时代的文学选集《本朝文粹》当中留下的咏颂史传人物的诗赋，就是当时学人的心得。

中国史传与文学的关联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说明，毋庸赘言，史书的“小说笔法”，就是其中一端。中国的史书传到日本，中国的修史藏典的制度也曾被移植到日本，不仅由此产生了《古事记》《日本书纪》《六国史》这些以汉文为主的日本历史著述，一时间公私兼有修史之举，而且催生出一批“物语风”的史书和宗教性的史论。中国人重视历史经验的思想也影响过一部分学者文人，林罗山、新井白石乃至江户时代的一些国学者都曾经写出过自己的

读史要著^①。至于在文学作品中吸收中国史传故事，也可以追溯到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书纪》中便有根据《汉书》记载改写的日本传说^②。现代日本学者研究和翻译中国史书方面，也以《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三史”业绩最著，可以说远绍宁乐（奈良古称）而近亲欧亚，有颇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第一节 中国史传文学的东渐历程

虽然中国以“三史”为中心的史书很早被称为日本纪传道学人研读的必读书，但是传播中国历史故事的途径绝不只是史书一条。纪传道等学术由于都是世袭相传，所以一般文人就难以登堂入室，他们接触中国历史故事就另有他门。一个重要的门径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的《蒙求》教育。《蒙求》以四字韵语概括的历史掌故，凝聚了古代仁人贤士富于个性特征的奇闻逸事，在平安时代便被改编成和歌等艺术形式，对于塑造和传播中国人形象起到了正史起不到的作用。关于《蒙求》的传播，需另作梳理，这里谨以史书的传播和翻译为线，着重分析日本文学家的借用与学人的解读。

一 《左传》

日本的《左传》研究著述，首先要提到的是秦鼎（1761—1831）所著《春秋左氏传校本》30卷。秦鼎为美浓（今岐阜县）人，字士铉，号沧浪、小翁、梦仙。该书于杜注之后附陆德明释文，载先儒之说善者。有丰岛毅增补本，录公羊、穀梁二传。此书20世纪80年代有松云堂覆刻本。其次要提到的是安井息轩（1799—1876）的《左传辑释》24卷。著者为江户末期儒者，日向（今宫崎县）人，名衡，字仲平，号息轩，就学于松崎慊堂（1771—1844）之门。长期仕于日向的饫肥侯，后为昌平黉儒官。该书以杜注为原注，次集汉唐至清儒诸说之善者，更多以独自见解纠杜注之误。在此之后，则有竹添井井（1842—1917）所著《左氏会笺》30卷。

竹添井井为熊本县人，名光鸿，称进一郎，字鸿卿，号井井居士。师事

^① [日]坂本太郎『日本の修史と史学』、至文堂1978年版。

^② 严绍璗、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12页。

安井息轩，仕于熊本藩。明治维新后为天津领事等。本书以宫内厅书陵部现存旧抄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今为底本，广收先儒注释，博取其善者，博引旁证，有《左传》注解集大成之称。会笺用作底本的书陵部卷子本，本为金泽文库本。金泽文库创设者北条实时（1224—1276）跟随清原家八代大儒清原教隆学习清原家累代相传的《春秋经传集解》的秘说时，书写校点了清原家传的集解本，后来实时之子笃时跟随教隆之子直隆（1234—1299）、俊隆（1241—1290）学习时抄写的此本，只是卷14、15、23、26四卷是在笃时之弟显时（1248—1301）跟随俊隆学习时抄写俊隆本的。清原家是平安朝以来的明经博士，以《左传》为家学。这一卷子本为清原家中兴的大儒赖业（1122—1189）的《左传》之学之后的珍本，很有价值，日本训读《左传》的源流实见于本书。它以遣唐使传来的唐写本为基础，今天仍是作为集解本的完本流传下来的最古善本。集解本的残卷，还有石山寺相传为平安时代抄写的集解本卷26、29两卷及东洋文库赖业加点的集解本卷10。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我国已有岳麓书社影印本。

此外，近现代的研究著述，亦有不少。简录如下：

斋藤要《春秋左氏传讲义》3卷，厚生阁，1941年。

竹内照夫《春秋左氏传》，中国古典文学全集2，平凡社，1968年。

镰田正《春秋左氏传》，中国古典新书，明德出版社，1968年。

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弘文堂书房，1928年。

饭岛忠夫《支那历法起原考》，冈书院，1930年。

津田左右吉《左传的思想史研究》，东洋文库论丛第22，1935年。

重泽俊郎、佐藤匡玄编《左传人名地名索引》，弘文堂书房，1935年。

重泽俊郎编《左传贾服注据逸》，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

上野贤知编《日本左传研究著述年表并分类目录》，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年。

镰田正《左传的成书及其展开》，大修馆书店，1963年。

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第四章《杜预春秋解释的方法、态度》），劲草书房，1964年。

二 《国语》

据大野峻《国语》（新释汉文大系本，明治书院，1988）载，日本有以

下多种《国语》研究著述。书末注有“未”字者，乃大野峻所未见。

1. 《国语》21卷 韦昭解，宋庠音，林道真（春）点。日本刻本即所谓和刻本宋庠“音”与宋庠“补音”，准确地说乃是明张一鲲本，与宋庠原本大不一样。林道真生于1583年，卒于1657年。和刻的训点实际上是一种解释，有很大参考价值。

2. 《春秋外传国语解删补》2卷，1763年刊本，渡边操（1690?—1760?）著。

3. 《国语校章》，荻生道济（1703—1776）著。道济乃江户时代著名古文辞派学者荻生徂徕之义子。仕于柳泽侯。

4. 《国语雕题》，中井履轩著。抄本。中井履轩（1732—1817）是大阪的大儒，继承父亲斎庵的怀德堂，在京都大阪地区享有盛名。

5. 《国语闻书》，3册，中井履轩著（未）。

6. 《国语韦注补正》，2卷，河野子龙（1742—1779）著（未）。

7. 《左国占例考》，片冈基成（1720?—1785?）著（未）。

8. 《重刻国语》，21卷，韦昭解，宋庠补音。明穆文熙编纂，千叶玄之（1726—1792）再校，1786年刊。到秦鼎的《国语定本》刊行以前，此书十分流行。栏外刻有穆文熙的评、柳宗元的《非国语》等。

9. 《国语略说》，8卷，1792年刊。关修龄（1726—1801）著。本书被大野峻称为“日本人研究国语的白眉”，多为秦鼎《国语定本》所引用。

10. 《国语律吕解》，1卷，1795年刊，平景教著。

11. 《国语考》，户崎允明（1729—1806）著。

12. 《国语独了》，2卷，龟井南冥（1743—1814）著。

13. 《增注国语》，21卷，1801年刊，冢田虎注。

冢田虎（1745—1832）号大峰，信浓人，仕于尾张藩。颇有见识，宽政年间禁异学时，主张言论自由。秦鼎《国语定本》多引用。

14. 《国语考证补遗》，葛西质（1764—1823）著。

15. 《国语定本》，21卷，1809年刊，秦鼎（1760—1831）著。

秦鼎为尾张藩的儒官，是江户时代研究《国语》最优秀的学者。卷首书韦氏解，宋氏补音，为公序本系的张一鲲本。通过公序本与明道本对校，可知其以公序本为底本而采用了明道本之长，并吸取了黄丕烈札记与关修龄

《国语略说》的许多说法。

16. 《国语考》，蒲坂圆（1775—1834）著（未）。
17. 《左国易一家言》，3卷，1817年刊，谷川顺一著。
18. 《国语考》，21卷，龟井昱（1773—1836），龟井昱为龟井南冥之子。
19. 《国语参考》，3卷，龟井昱著。
20. 《国语国字解》，21卷，山义雄著。抄本，著者生平不详，东京教育大学藏。
21. 《标注国语》，帆足万里（1778—1852）著。
22. 《国语解》，东条弘（1778—1857）著（未）。
23. 《读国语》，4册，蓝泽祇（1791—1860）著。
24. 《标注国语定本》，21卷，1884年刊。高木熊三郎题秦鼎定本，中井履轩雕题，高木熊三郎标注。
25. 《国语国字解》，2册，1917年刊。桂湖村著，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刊行。收于《先哲遗著追补 汉籍国字解全书》第41、42卷。以本书为开端。如《汉文丛书》《国译汉文大成》等以日语训译为主、汉文为辅的著述开始流行。本书为桂湖村的力作，叙说约240页，还包括解题、各种表、索引、研究参考书。韦昭国语解叙的解释说明。特别是地名一览与索引、注释书解题，用力颇勤。大野峻对桂氏之说虽时有严厉批判，对《国语》传本特别是秦鼎“定本”与本书即《汉籍国字解本国语》的底本抱有很大疑问，但仍充分评价桂氏的功绩，赞赏桂氏的博学；并为本书难于搞到却又再版无望深表遗憾。
26. 《国语》，1册。中山久四郎著，有朋堂书店1920年刊，收于《汉文丛书》。栏外以细字收本文，主体则是日语训读文。
27. 《国语国译》，国民文库刊行会1923年刊，林泰辅著，前川三郎解题。收于《国译汉文大成》。以日语训读为主体，加以注解，原汉文以明道本为主，行间注以与公序本、董增龄对校的字句的异同。前川三郎为林泰辅的助手，“国译”完成不久，林泰辅去世，解题完成于前川之手。
28. 《国语》，大野峻著，明德出版社1969年刊。收于《中国古典新书》，附解题与原文的摘译、译文既有训译，又有口语译。反映出从训译向口语译推进的过渡形式。

29. 《战国策·国语·论衡》，常石茂译，1972年平凡社版。日语摘译本。现代日语译，未收原文。

大野峻认为，在日本的《国语》传本，以“公序本”中的俗本“张一鲲本”为主流，然而从中国清代嘉庆四年明道本重刊以来，直到现代，则是“明道本”盛行。这种情况也影响到日本。林泰辅国译汉文大成《国语》的凡例中说：“《国语》原本可凭信者以天圣明道本为最。世有定评。”不过，大野峻则认为，对“公序本”的真实价值应进行再评价。

现代日本的《国语》研究，除注释外，考证则以林泰辅1904年发表于《史学杂志》的《国语考》为最早，1957年贝冢茂树在《东方学》第14辑上发表了《国语里出现的说话的形式》。大野峻是专门研究《国语》的学者，先后发表论文多篇，举其要者，有：

《中国古典〈国语〉、〈论语〉的“语”的意义和〈论语〉的对话分析》，1968年，《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第11辑，东海大学出版会。

《〈国语〉的诸国与郑语的疑问点》，1969年，《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第12辑，东海大学出版会。

《〈国语〉公序本的再评价》，1975年，《东海大学纪要文学部》第22辑，东海大学出版会。

《范蠡说话的矛盾与〈国语·越语〉下篇的问题》，1975，《湘南大学》第9号。

另外，铃木隆一编有《国语索引》，1934年由大安出版。

三 《史记》

奈良时代之后，平安时代用日文训读《史记》，则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室町时代五山僧侣爱读《史记》，讲解《史记》的有月舟寿桂的《史记世家抄》、桃源瑞仙的《史记桃源抄》等传世，后来还出了不少注释之著，刊本以嵯峨本、评林本的八尾版与红谷版最为著名。

嵯峨本，承袭宋人元本刊本，元和九年出世的吉田素庵将朝鲜覆刻本以活字版刊行。评林本传承有两种，宝永十三年（1636）京都三条八尾助左卫门刊行的是八尾版，宽永十三年（1673）京都红谷刊行的是红谷版。以上嵯峨本、八尾版、红谷版三种版本之中，八尾版的史记评林最为流行，曾在各

处刊印。

《史记》传入日本的准确时间尚未判明，有学者认为圣德太子十七条中用了出自《史记》的典故。奈良时代制定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史记》与其他经史子书同时作为引用材料，但当时《史记》是否传来，尚无旁证。《续日本记》卷29神护景云二年（768）9月11日有日向国宫崎郡的人大伴人益把赤目白色龟当做祥瑞之兆献上的记载，其时，人益在上奏文中引用了《史记》卷128《龟策列传》中“神龟者，天下之宝也”以下的一段。另外，《续日本纪》卷30神护景云三年（769）10月10日条记载称德天皇应大宰府之乞：“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给列代诸史，各一本，管内传习，以兴学业”，下旨赐《史记》到《晋书》的历代正史。

平安时代公私藏书目录都出现了《史记》。藤原佐世奉伤于宽平年间（889—897）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史记》80卷，裴骃《集解》”。藤原通宪的《通宪书目录》里作为史书之一著录了“《史记索隐》上帙7卷、中帙10卷、下帙9卷”。

《诸家家业记·儒门·纪传道》说：“纪传道以《史记》《汉书》《文选》之类为第一，以诗赋文章为表，经书为里。而儒门以纪传道为第一。古时由菅、江两家及日野南家之人担任，后世则为菅原一族之家业。”^①这说明，平安时代的纪传道将《史记》《汉书》和《文选》等作为最主要的学习与研究内容，而菅原家历代世袭，在纪传道中一花独放，因而至今相传平安时代那些咏唱《史记》《汉书》的诗篇出于菅原家的学人者居多。

平安时代纪传道对中国史书的重视，不仅促进了日本史书的编撰（如《日本书纪》《类聚国史》《新国史》《日本纪略》《本朝世纪》《扶桑略记》等史书，均多仿中国史书），形成了宫廷修史藏书的传统，而且也大大有助于培育日本重视文化、尊重知识的传统，尽管历经战国、南北朝频仍战事的阻隔，至江户时代以后，这一传统久远地延续下来。尽管学问曾因菅原家、清原家的一家单传而带有不可避免的封闭性与单一性，但借力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典籍，对中国历史经验和杰出人物事迹的学习与尊重，也深深地浸透

^① [日]『古事類苑 文學部』五、吉川弘文館 1983 年版、第 354 頁。

到日本前近代的学问之中。

平安时代的敕撰三集（《经国集》《凌云集》〔814年成书〕《文华秀丽集》）〔818年成书〕）以及诗文选集《本朝文粹》〔1060年前后成书〕《本朝续文粹》，都载录了文人学士在天皇于宫廷中举办的研读《史记》的宴会之后咏唱的诗赋，

平安时代宫廷效仿唐代的宫中博士讲书制度，将宫中讲书当做天皇的修学仪式。讲学的内容有《论语》《孝经》等经书，也有《史记》《汉书》及《文选》等。根据片断保留下来的同类讲书的笔记推断，讲书时博士要精讲原文，对原文加以校勘、训读，并回答质疑。按照惯例，讲学后举行“竟宴”，讲课的博士及听讲者，大抵三十几人，均要出席，并令学人以该书中人物为题赋诗，以展示天皇的尊诗重文，是“崇文”的举措，也为制造识贤爱才、君臣同心的氛围。因而，宴席既从属政坛，又是诗坛。同类的讲书，还有讲述日本自编史书《日本书纪》的，宴会上则咏唱和歌，和歌题目则是《日本书纪》中的人物。

从《史记》竟宴咏唱的诗篇中，不仅可以看出哪些是最为当时皇室贵族倾心敬服的中国历史人物，更可以看出当时皇族贵族的治国理政的观念。

如果我们暂且将平安时期各个阶段的变化放在一边，仅从与《史记》有关的诗篇来看，它们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敬意。

《凌云集》载平安前期官吏、汉诗人贺阳丰年（751—815）《史记竟宴，赋得太史公自序传》：

宏林承五百，博瞻剑三千。

第（一作茅）穴遗文藉，梧巖古册全。

屈（一作灰）中（一作尺）天庆起，识大日官传。

张辅称孤秀，且明耻独贤。

名高良史籍，身毁妒臣年。

美丑悬声价，爰言陵谷迁。^①

^① [日]国民图书馆株式会社编『日本文學大系』第二十四卷、国民图书馆株式会社1928年版、第118頁。

菅清公，即菅原清公（770—842）有《赋得司马迁一首》，载于《文华秀丽集》：

汉史惟司马，高才为代生。
龙门初降化，禹穴渐研精。
续孔春秋发，基轩得失明。
三千犹存眼，五百但嫌情。
实录传无坠，洪漪游（一作逝）不停；
终令万祀下，长作百王祯（一作桢）。^①

其次是对《史记》所载明君贤臣德业的赞颂。天皇赞良臣、臣子颂明君，都是在借描绘心目中崇拜的理想形象来表达对眼前在位的君、臣的赞颂与期待，前者如《文华秀丽集》卷中尚载 52 代天皇、809 至 823 年在位的嵯峨天皇（786—842）御制《史记讲宴赋得张子房一首》：

受命师高祖，英风万古传。
沙中义初发，山中（一作里）感愈（一作弥）玄。
形容类处女，计划挠强权。
封敌反谋散，招翁储贰全。
定都是刘说，进宰劝萧贤。
追从赤松子，避世独超然。^②

“进宰”，《文华秀丽集》卷中作“违宰”，当以“进”为是。

后者如仲雄王尚有《赋得汉高祖一首》。平安前期官吏、汉诗人仲雄王（生卒年不详）是《文华秀丽集》的主撰人，序言的撰写者，其中收有他的作品 13 首。他曾任大舍人头兼信浓守，与藤原冬嗣、良岑安世、最澄、空海过从密切。

^① [日] 国民图书株式会社编『日本文學大系』第二十四卷、国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8 年版、第 171 頁。

^② [日] 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説『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 2000 年版、第 5 頁。

汉祖承尧绪，龙颜应晦冥。
豁如有大度，生来未曾营。
住在中阳里，微班泗上亭。
吕公惊贵相，王媪感奇灵。
望气秦皇厌，寻云吕后停。
经关创汉统，军旅入咸京。
拨乱资三杰，膺天聚五星。
武将穷楚项，轵道降秦婴。
命革登乾极，时平戢甲兵。
锋侯重厚者，刘氏遂安宁。^①

岛田忠臣（828—892）是贵族，汉诗人，有《田氏家集》，其中载《于右丞相省中直庐读〈史记〉，竟咏史得高祖，应教》，亦载《日本诗纪》十三：

金刀受命自然名，大泽陂头梦遘精。
龙怪到家频漫醉，蛇灵当径勿妨行。
青山隐迹云还识，紫蓀裁冠雨便轻。
腻手多年长握剑，强心报敌拟分羹。
床前倨傲看来客，塞上宽容用义兵。
始约三章关老庆，能言十罪项王惊。
咸阳寝尽秦煨灭，汜水尊成汉火明。
万乘威加新海内，数行泪落故乡情。
任官重厚须安嗣，嫌疗良医不患生。
圣业弥天终四百，长陵松柏奏风声。^②

再次，是对《史记》中人物命运的品味。《史记》中写了很多有故事的

^① [日]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日本文學大系』第二十四卷、國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8 年版、第 170 頁。

^② [日]市河寬齋編、後藤昭雄解說『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 2000 年版、第 110 頁。

人物。从平安前期这些讲史竟宴赋诗的诗题来看，和当时另外一种讲经竟宴多以经文中的诗句或文句为题不同，多以史传人物为题，从这些题目可以推测，在讲宴上讲说探讨的可能多从《史记》中的《传》部分选择，这也是书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部分，通过历史人物的事迹去了解和学习历史，可谓最容易被接受、被感染的方式，同时也是诗歌较易表现的内容。这些诗中不难看出六朝初唐咏史诗的影响。

文学博士都良香（834—879），今传《都氏文集》，他作有《得傅说，〈史记〉竟宴》，收于《日本诗纪拾遗》：

理在暗投虽可眄，感因冥致拟相思。
便搜草野营求去，乍到烟岩趁载归。
涧水咽流初泣别，山嵐吹送自含悲。
酿为麹蘖樽醪美，和作盐梅鼎味滋。（《掷金抄》中文学部）^①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述的毛遂自荐故事，写出了一位久遭埋没却勇于担当的士。岛田忠臣《〈史记〉竟宴，咏史得毛遂》：

赵胜知士早，毛遂出群迟。
客舍三年默，荆楚一旦威。
既挥升殿剑，终脱处囊锥。
寄语他同辈，如何目击时。^②

诗中赞扬毛遂能脱颖而出，最后一句，“如何目击时”，有些费解。或为如何看清时机之意。

良岑安世（785—830）《赋得季札》载于《文华秀丽集》卷中：

所谓吴季札，芳名冠古今。
交贤情若旧，当让义逾深。

^① [日]後藤昭雄编『日本詩紀拾遺』、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5頁。

^② [日]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説『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129頁。

晏子终纳色，孙文不听琴。
还将一宝剑，空报徐君心。^①

“芳名”，《日本诗纪》注：“一作命。”“名”、“命”草书易混，似以“名”字为佳。“纳色”，《日本诗纪》作“邑”，注“一作色”，“色”、“邑”形近，据文意，当作“邑”。《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季札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②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孙文，指孙文子，事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菅原道真（845—903）《〈史记〉竟宴，咏史得司马相如》：

夫子犹司马，相如有旧闻。
官嫌为武骑，曲喜得文君。
苦谏长杨猎，多劳广泽军。
大人今可用，何处不凌云。^③

《扶桑集》载纪长谷雄（845—912）《北堂〈史记〉竟宴，各咏史，得叔孙通》：

怀明难照世多艰，直道如谀十主间。
他日遂逃秦虎口，暮年初谒汉龙颜。
光加粉泽洪基贵，道拂风波少海闲。
一代儒宗君第一，于今吾辈仰高山。^④

平安诗人还注意到《史记》中那些关于人物性格细节的描绘。如《经国集》载前期官吏、汉诗人仲雄王《杂言彘肩一首》。

① [日] 国民图书株式会社编『日本文學大系』第二十四卷、国民圖書株式會社 1928 年版、第 170 頁。

② [汉]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457 页。

③ [日] 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草 菅家後集』、岩波書店 1978 年版、第 131 頁。

④ [日] 田坂順子編『扶桑集——校本と索引』、權歌書房 1985 年版、第 86 頁。

彘肩肉赤凝脂白，登俎更待庖丁手。
銮刀磨石刃如霜，坐客看之相嚼久。
盐梅初和人争喫，口饱情闲何欲有。
君不见汉家一壮士，拔剑宁辞一杯酒。①

《史记·项羽本纪第七》写鸿门宴上刘邦之参乘樊哙为救刘邦，挺身而出，项王与之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这一细节，写出了樊哙的无畏与豪勇。仲雄王被这一细节所打动，赋诗赞颂“汉家一壮士”的豪情壮举。《经国集》所载此诗中的“挾剑”疑为“拔剑”之讹，“挾”字与“拔”字书写形近易混。

《项羽本纪》中描绘的项羽、虞姬之死，哀婉动人，永远是诗人怅恨的源泉。橘广相（837—890）《咏项羽》有“灯下数行虞氏泪，夜深四面楚歌声”之句②。

还有一些《史记》竟宴所咏的诗，很注意体味古代人物的复杂情感。三善清行《得孔子，〈史记〉竟宴》：“徂年难驻心伤凤，至德将衰眼泣麟。”③就着力刻画孔子的悲哀与无奈。

平安时代后期，随着皇族势力的减弱，这种讲经讲史竟宴赋诗活动走完了鼎盛期，主政的藤原氏仍希望从《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中汲取历史经验，咏颂《史》《汉》的诗篇时有所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藤原忠通的一组读《史记》诗。

公卿、摄政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通（1097—1164）作有数首咏唱《史记》之作，如《读〈史记〉赋周本纪》：

披书唯考周朝事，三十六王一卷陈。
牛放桃林花脆晓，马嘶华山草深春。

① [日]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説『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56頁。

② [日]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説『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106頁。

③ [日]後藤昭雄編『日本詩紀拾遺』、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10頁。

自尊姬旦往事迹，谁教养由旧日尘。
可悦可康治德昔，采诗官定欲知仁。①

藤原忠通又有《读〈史记〉赋秦本纪》：

秦先次第载经史，源起高阳后几程。
官室若无华饰构，戎夷岂有谤讪情？
放汧春马莫间息，赠晋昔船风底行。
非只武功专赏赐，孝公政令务农耕。②

“莫间息”与“风底行”相对，“莫”当为“草”之讹，放马南山，让战马在草间养息，“莫间息”则不辞。

藤原忠通还有《读〈史记〉赋周公世家》：

姬旦何人邦重器，孝仁才艺盖相并。
披书君酒数行泪，待士吾催三把情。
久佐周年朝市政，更闻洛水晓波声。
成王叔父武王弟，天下被知不赋名。③

藤原忠通《燕世家》，也属于上述一组：

巡行乡邑召公奭，自陕以西司正任。
军徒荆轲持节日，民歌棠树落花阴。
燕王车是二千乘，赵主酒犹五百金。
郭槐若无教已举，万方贤士岂来临？④

① [日]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說『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443頁。

② [日]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說『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443頁。

③ [日]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說『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443頁。

④ [日]市河寛齋編、後藤昭雄解說『日本詩紀』、吉川弘文館2000年版、第443頁。